

● 国外建筑理论译丛

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AL THEORY

1968 to the Present

Harry Francis Mallgrave, David Goodman

建筑理论导读 ——从1968年到现在

[美] 哈里·弗朗西斯·马尔格雷夫 著
戴维·戈德曼 著

赵前 周卓艳 高颖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外建筑理论译丛

建筑理论导读 ——从 1968 年到现在

[美] 哈里·弗朗西斯·马尔格雷夫 著
戴维·戈德曼 著

赵 前 周卓艳 高 纲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2-881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理论导读——从 1968 年到现在 / (美) 马尔格雷夫, 戈德曼著;
赵前, 周卓艳, 高颖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10
(国外建筑理论译丛)
ISBN 978-7-112-19786-6

I . ①建… II . ①马… ②戈… ③赵… ④周… ⑤高… III . ①建筑理论
IV . ① TU-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4735 号

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al Theory: 1968 to the Present / Harry Francis Mallgrave and David Goodman,
978-1405180634 / 1405180633

Copyright © 2011 Harry Francis Mallgrave and David Goodma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Wiley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没有 John Wiley & Sons, Inc. 的授权, 本书的销售是非法的

本书经美国 John Wiley & Sons, Inc. 出版公司正式授权翻译、出版

本书是第一本全面介绍自 1968 年以来过去 40 多年间重要的建筑理论和建筑思想的图书。它以敏锐而生动的文字阐述了深刻的问题, 描述了发生在建筑思想领域中的一场真正的革命, 以及这种知识大动荡所带来的影响。本书也是第一本完整的且具有批判性的建筑理论史, 它涉及了广泛意义上的建筑理论架构, 包括城市规划、建筑结构和景观设计; 涵盖了对自 1968 年以来的建筑思想史的调查(包括对高技派现代主义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 批判的地域主义和建构), 全面回顾了过去 15 年在建筑思想中所产生的显著变化, 系统介绍了 20 世纪的 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三个 10 年中出现的新理论观点及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总结、分析了建筑领域的现状及其未来一些年可能会出现的趋势。

本书实例充足、文字生动, 观点鲜明, 条理清晰, 语言通俗易懂, 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对我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相关专业的在校师生而言, 这无疑是本很有价值的建筑理论文献, 而对建筑历史、建筑理论感兴趣的一般读者而言, 本书也具有较高的阅读性。

责任编辑: 董苏华

责任校对: 王宇枢 张 颖

国外建筑理论译丛

建筑理论导读——从 1968 年到现在

[美] 哈里·弗朗西斯·马尔格雷夫 戴维·戈德曼 著

赵 前 周卓艳 高 颖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 9 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1/4} 字数: 353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一版 201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9.00 元

ISBN 978-7-112-19786-6

(2930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序言 20世纪60年代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建筑界被两大价值观所主导。一种表现为现代性视野下的政治信仰——社会改良派相信通过影响社会变革并建立起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环境秩序，建筑师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人性，也能挽救由于全球物质和精神破坏而产生的灾难。另一种则相信技术及其应用是行之有效的最佳途径。面对这些豪言壮语描述下的理想，有人可能会说在统一的现代性前提下，20多年来，技术幻想一直迷惑着建筑风格的“女主人”，而她却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种令人兴奋的诱惑会如此之迅速便失去了魅力。

其实，我们在追溯历史时不难发现这时期存在一些预示着未来建筑将发生分歧的迹象。1947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年）提出地域性现代主义的可能性，但却遭到了自封为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权威的无礼审查。¹同年，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 1918—1999年）^①在布里奇沃特^②召开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上挑战了奉行现代设计的极端理性主义者，然而并未得到支持。²1953年，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城举行的另一次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建筑师团队递交了一份住宅设计方案，其建筑样式与国际现代建筑协会所推崇的典范大相径庭，而来自伦敦的另一建筑师团队也大胆挑战了《雅典宪章》提出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³1959年，作为意大利颇有力的杂志《美屋》^③的编辑，厄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在两个层面上质疑建筑现状：其一，意大利从现代主义“撤退”，这主要表现为近期一些建筑师着迷于20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ty）形式；其二，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已成为历史主义致命的子弹——也就是说建筑渴望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有时也应谦恭有礼地参照历史。说也奇怪，这种对现状的抨击居然

^① 荷兰建筑师，年轻时曾在英国接受教育，是结构主义建筑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1954—1959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建筑学院任教，1966—1984年任代尔夫特技术学院教授。凡·艾克是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活跃成员，也是“十次小组”的主要创立者，他主张建筑设计应摈弃功能主义，回归人文关怀，认为二战后所谓的现代主义建筑实际上大都缺乏创新。1959年到1963年，他一直是荷兰著名建筑杂志《论坛》的编辑（于1967年重返该职位），这也为他宣传“十次小组”的观点提供了极大便利。——译者注

^② 美国南达科他州下属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③ 即 Casabella—continuità，意大利知名的建筑与产品设计杂志，月刊，它创办于1928年的米兰，着眼于现代激进的设计，也包含对世界杰出建筑师的采访。——译者注



图 P.1 维拉斯加塔楼, BBPR, 米兰 (1950—1958 年)。
本图经戴维·塞奇 (Davide Secci) 许可

促成了罗杰斯 (他的设计公司是 BBPR's) 的设计作品维拉斯加塔楼 (Torre Velasca, 1950—1958 年, 图 P.1) 的建成。这座建筑是米兰市区的一座现代混凝土塔楼, 对很多评论家而言, 它悬挑出的顶部楼层唤起了人们对意大利中世纪城镇的回忆。这次, 来自官方的反应是快速而敏锐的, 在荷兰奥特罗举办的第 59 届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上, 罗杰斯的历史主义隐喻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早在几周前, 针对意大利杂志《美屋》着迷于“新自由”风格的问题, 著名的建筑评论家雷纳·班纳姆 (Reyner Banham, 1922—1988 年) 即使没有谴责它的隐喻手法, 也对其告诫:

若用马里内蒂^①的语言来形容拉斯金^②的理想的话, 那就是: 为建筑披上旧装就像一个人虽然身体已经完全成熟, 但还想在自己的婴儿床上再睡一

觉, 重温被年迈的保姆哺育的快感以恢复儿时的平静。即使以纯粹的米兰和都灵地方标准来衡量, “新自由”风格也是一种幼稚的回归。⁴

3

技术和生态

实际上,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班纳姆已经成为技术领域中的佼佼者, 并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尽享其胜利成果。他文学上才华横溢、多产且敏锐, 50 年代后半期一直在杰出的德国流亡历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 (Nikolaus Pevsner) 的引导下致力于意大利未来主义的研究。与此同时, 他还参加了伦敦新粗野主义 (New Brutalist) 运动兴致勃勃的讨论, 并且还与“独立小组” (Independent Group)^③ 中主张突破传统的一派过从甚密。其中,

① 这里是指意大利诗人、文艺批评家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1876—1944 年)。作为 20 世纪初未来主义运动的发起者, 他于 1909 年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 提出了未来主义的一些主张, 表现出对陈旧文化思想的憎恶和对速度、科技等元素的狂热。——译者注

② 约翰·拉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 年),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艺术家、作家、艺术评论家。他主张回归中世纪社会, 倡导手工艺劳动, 其思想对工艺美术运动中威廉·莫里斯等人的影响很大。——译者注

③ 从 1952 年开始, 在伦敦以当代艺术学院为中心, 汉密尔顿等一批年轻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评论家开始讨论当代技术和通俗表现媒介的相关问题, 他们自称为“独立小组”, 着重讨论大众文化及其含义, 如西方电影、广告牌、机器之美等, 该团体迷恋新型城市的通俗文化, 尤其被美国的表现形式所吸引。——译者注

后者是伦敦当代艺术学院（London'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的一个艺术论坛，参加者包括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 1922—2011年）^①、劳伦斯·阿罗韦（Lawrence Alloway, 1926—1990年）^②、约翰·麦克黑尔（John McHale, 1922—1978年）^③。他们志同道合，均对美国爵士乐、大众文化、好莱坞电影、科幻以及底特律汽车表现出近乎病态的热爱，这也在向世人表明：虽然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但他们觉醒的灵魂却正徘徊于追求某种更伟大的目标的边缘。

1960年，班纳姆的博士论文《第一机器时代的理论和设计》（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 1960年）在建筑理论界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在于其本身学术成就，而更主要的在于其对“功能主义与技术”的关注。班纳姆的主要观点是：被诸如汽车和远洋邮轮所鼓舞的“第一机器时代”现在其实已被更令人神往的“第二机器时代”所取代（当然还未被颠覆）。能够明确解释这一时代趋势的是一些新生事物：电视、广播、电动剃须刀、吹风机、磁带录音机、搅拌器、研磨机、洗衣机、冰箱、真空吸尘器以及磨光器，这些新玩意儿使今天的家庭主妇拥有了比20世纪初产业工人还强大的动力。如果20世纪20年代的汽车对于文化精英而言是地位象征的话，那么电视（第二机器时代的机器象征）则使民主精神成为大众娱乐的重要传播目标。⁵所有新机器时代缺乏的正是恰当的理论。

通过随后几年一系列的演讲和写作，班纳姆逐渐弥补了这种不足。面对越来越多的激进观点，他认为完善这种理论当务之急的就是更彻底地接纳技术及其概念。然而，这样的策略也是充满危险的，至少对不断增长的、自鸣得意的建筑业而言是如此：

4

打算以技术为契机的建筑师知道自己必须与速度赛跑才能保持设计的先进性，他可能必须模仿未来主义者，并放弃自己全部的文化素养，包括那种易于辨认的职业外表；另一方面，若他决定另辟蹊径，可能又会发现即使没有他，技术文化也会继续发展。⁶

班纳姆对建筑界深信不疑地以巨型结构来解决几乎所有城市问题的现状感到困惑，经过两年的深思熟虑，他决定在伦敦重要的建筑杂志《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上质疑建筑的这种优柔寡断。⁷此时，英国已经在建造几座巨型城市，然而年轻一代却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生于匈牙利的以色列建筑师尤纳·弗里德

-
- ① 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 1922—2011年）是世界上最有力的当代艺术家之一，波普艺术的领军人物，杜尚的学生，其代表作有“到底是什么使今日的家庭如此非凡迷人”。——译者注
- ② 劳伦斯·阿洛韦是英国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也是“波普艺术”这一术语的发明者，20世纪50年代，他曾是“独立小组”的主要成员，自60年代起开始定居美国。——译者注
- ③ 约翰·麦克黑尔是出生于苏格兰的艺术家和社会学家，也是“独立小组”和伦敦当代艺术学院的创办者。——译者注

曼 (Yona Friedman, 1923 年—)^① 创建了“移动建筑研究小组”(Group d'Etude d'Architecture Mobile, 简称 GEAM), 并提出了“空间城市”的设想: 全球应倾力建造 1000 个巨型城市, 其中每个城市能容纳 300 万居民。弗里德曼常与一些艺术家和思想家合作, 如埃克哈德·舒尔策·菲利茨 (Eckhard Schulze-Fielitz)、保罗·迈蒙 (Paul Maymont) 和康斯坦 [尼乌文赫伊斯 (Nieuwenhuys)]·弗雷·奥托 (Constant Frei Otto, 1925 年—)。弗里德曼提出了“可移动的建筑”以应对躁动不安的社会中存在的永无休止的变化。在高耸于被舍弃了的大地景观之上建造一个多层次的空间框架, 居住者可以在这个空间框架中自由插入自己的居住单元, 即使是食物生产也可以在高层的城市绿屋中进行。⁸

同年, 日新的新陈代谢派 (Metabolist) 正试图以技术上异想天开的建筑方案来解决密集城市的人口问题。⁹ 与此同时, 伦敦正在体验阿基格拉姆学派 (Archigram) 漫画书中奇妙幻想所带来的快乐, 而未来主义者的另一个派别也正沉溺于对技术的迷恋。就他们付出的努力而言, 1964 年也许是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彼得·库克 (Peter Cook) 的“插入城市”和罗恩·赫伦 (Ron Herron) 的“行走城市”引起了巨大的轰动。¹⁰

在这种异想天开的欣喜背后有一位技术专家, 他就是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 (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 1895—1983 年)^②, 而在他众多的崇拜者中“布基”(Bucky) 这个名字更广为人知。从 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开始, 基于对非线性思想和“少费多用”(ephemeralization) 的坚定信念, 富勒一直奔走于世界各地建筑院校的演讲大厅, 他认为对这类建筑不应以通常的审美观来评判, 而应以其重量和生态完整性的程度来衡量。如果说 1928 年美国建筑师学会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忽视了他“以最少结构提供最大强度”(Dymaxion) 的建筑 (20 世纪最早的、以可持续发展为明确目标的尝试) 的话, 那么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时富勒已不再被忽视。他的信箱里塞满了各种客座教授和演讲的邀请函, 荣誉开始垂青于他。当然, 那种宣传在他为 1967 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设计建造的网格穹顶中达到了极点, 然而人们只关注于他思想中的这一方面, 却忽视了他更重要的理论贡献。

早在 1955 年, 富勒就已经与伦敦的“独立小组”以及约翰·麦克黑尔有所联系。在

① 1923 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初, 因其巨型城市结构的设想而成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他为躲避纳粹迫害而迁居以色列城市海法达 10 年, 1957 年后定居巴黎, 1966 年成为法国公民。他从未有过建成物, 但其想象力却影响了当今城市和建筑领域最前卫的实践者。——译者注

② 美国哲学家、建筑师及发明家, 曾在 1946 年取得“戴麦克逊地图”(Dymaxion map) 投影法的专利。在他的一生中, 他论述了关于技术与人类生存的思想。他称这种思想为“dymaxion”(最大限度地利用能源, 以最少结构提供最大强度), 这个词来源于三个单词: Dynamic (意思是动力), Maximum (意思是最多、最大), 还有 tension (意思是张力)。富勒对“dymaxion”这个词的解释是: 用很少能量做更多事情的方法, 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按照这种思想来完成的, 如他设计过一种“戴麦克逊车”, 一座“戴麦克逊房子”和一张“戴麦克逊世界地图”, 但也许他的另一项发明更为著名——由许多直线型材料制作而成的穹顶。——译者注

写给他们的信件中，他曾对奉行“国际式”风格的现代主义建筑师提出批评，认为他们仅仅肤浅地关心“浴室”的美学，而不关心墙后面的管道工程。这种批评使班纳姆深受触动，以至于在《第一机器时代的理论和设计》的结论中，他引用了这封信的一部分内容。¹¹麦克黑尔也大受感染，并于1962年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实践，前往美国并开始了与富勒的合作。同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以富勒的创作为主题的专著《世界资源清单：人类的趋势与需求》(Inventory of World Resources: Human Trends and Needs)。¹²10年后，麦克黑尔被公认为未来主义的主要领导人。

然而，富勒已经开始了向其他方向的拓展。1963年，他曾向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中的高级结构研究小组咨询，此时美国正在计划首次载人登月事宜。富勒以自己的方式，通过参照返回地球的层际空间生态系统而思路豁然开朗——“该系统的生活配套设施是空间技术的独立生活装置与汽车工业技术的结合，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10年地球上将大量生产并使用自主生活技术。”¹³简而言之，他认为地球也像是一艘宇宙飞船，这种研究经验一定会有助于解决世界上的住宅问题，因为“古老的建筑艺术”基本上已落后于先进的技术，而无论如何提供住房的仅占世界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

这一主题在《得洛斯宣言》(Delos Declaration)中引起了共鸣，富勒及其他33名科学家还在得洛斯岛上签署了一份协议。这座神圣的岛屿是神话中阿波罗合法但不适宜居住的出生地，科学家们在这里进行了为期8天的希腊岛游览。这次游览从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出发，到雅典结束。因为雅典既是《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①的诞生地，也是著名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康斯坦丁诺斯·道萨迪亚斯(Constantinos Doxiadis, 1914—1975年)^②伟大设想的诞生地——他曾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汇集于此，试图就全球人口的任意增长提出一个科学(人类聚居学)的解决方案。¹⁴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全球规划”的思想成为富勒追求的主题，这正如我们控制一个具有有限资源的层际空间星球的想法开始受到公众关注一样。¹⁵1965年，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 1910—1993年)^③在一篇向空间科学委员会提交的短文中贴切地谈到了这一点。其标题是《地球正如宇宙飞船》(Earth as a Space Ship)，文中博尔丁认为生态学对于人口无限增长和生态污染缺乏深刻的洞察力，他严厉地批评了新兴的生态学运动：“作为一门科学，生态学还远未超越观察研究鸟类的水平。”全球既要从使用矿物

① 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师协会(CIAM)第4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城市功能分区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它集中反映了当时探索新建筑的观点，特别是法国勒·柯布西耶的观点：要将城市与其周围影响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译者注

② 希腊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成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城市规划。20世纪50年代，他创办了“雅典人类聚居学研究中心”(Athens Center of Ekistics)和“雅典工学院”(Ath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从事人类聚居学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译者注

③ 1910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毕业于牛津大学，1948年成为美国公民。博尔丁是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和平主义者、诗人、宗教神秘主义者、虔诚的贵格会教徒、系统论科学家和哲学家。他是系统论的创建者之一，还独自开辟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诸多研究领域。——译者注

6 燃料转变为利用海洋能源和太阳能源，也要着手研究相互制衡的地球系统。¹⁶ 正如他在结论中所写的那样：“例如，我们不懂冰川时代的机制，地质稳定或干扰的真正本质，火山作用和地震的影响范围，我们居然也不懂复杂的被称为大气的热力机。”¹⁷

1965 年，富勒针对这一点发起了“世界设计学十年”的活动，他最初设计的一个方案后来成为 1967 年世界博览会的焦点。该方案以“世界游戏”（World Game）著称，它连接计算机（另一项技术发明）和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以便记载全球资源并设计最高效的资源利用方法。这个方案最初以南伊利诺伊大学为中心，1969 年夏天时初见成效，然后很快便有成百个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加入其中，在临时的网格穹顶中完成了很多研究。同年，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富勒也出版了一些直接涉及环境主题的著作：《乌托邦或遗忘》（Utopia or Oblivion, 1969 年）、《地球号宇宙飞船的操作手册》（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 1969 年）、《我看上去是个动词》（I Seem to be a Verb, 1970 年）、《走向有益的环境》（Approaching the Benign Environment, 1970 年）、《直觉》（Intuition, 1972 年）以及《地球有限公司》（Earth, Inc., 1973 年）。包括他的两卷《协同论》（Synergetics）在内，这些集中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的作品是他作为几何学家的成就的迸发，使我们得以全面领会他独特的视角。20 世纪 60 年代，很多建筑学的学生偏爱富勒奇妙的思想理念，尤其是布基反过来称颂建筑师们为最后的广博思想家，他们不愧是人类最后的伟大希望。

现代主义的社会基础

如果我们转而分析热衷于技术的社会组成，可以发现人们在不断地质疑这种改革观——现代主义整体上缺乏公众需要的通俗性与亲和力。然而，这些也并非新鲜事。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早期现代主义者无装饰的建筑形式并没有被公众很好地接受，而 10 年后在英国，当它们进入德国建筑师作品集寻求庇护时，这种情况则更差一些。1940 年，英国批评家詹姆斯·莫德·理查兹（J.M. Richards）在《现代建筑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Architecture）一书开篇时即承认了公众并不喜欢这种新风格的事实。然而，他却相信当人们认识到现代主义的美学和结构基础后会接受这一风格的。¹⁸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得到改观，以至于 1947 年时，理查兹再次提醒国际现代建筑协会注意此事，经过几次客气斯文的讨论后，这一议案被搁置在一边。

在北美，即使企业界很快认可了高层玻璃幕墙——钢和玻璃的新技术在经济上的优势，公众也并没有对这种风格产生好感。在美国，很多欧洲人司空见惯的国际式现代主义风格饱受非议，这种不满实际上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美国存在非正统的现代主义，它自 19 世纪 90 年代起在北美已有所发展，这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 1856—1924 年）学派和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1869—1959 年），其次要提到的是在美国南部和西海岸沿线存在着多种现代主义的地域性解释；另一个不满来源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的“现代”城市设计策略。现在已很少有人还记得林登·约翰逊（1908—1973年）^①“伟大社会”计划中的一些城市更新观念了，这个计划于20世纪60年代在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首次贯彻实行。这期间，美国很多城市都在清除建筑物——国家常利用政治手段为高速公路的修建扫清社会障碍，这也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的快速衰退。10年间，虽然建筑师们顺利地接受了高层建筑的“方案”，但是伴随城市聚居区而来的却是诸多问题：种族隔离、贫穷、福利和犯罪。

事实上，只有到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建筑师和批评家才开始认识到这些政策严重的局限性或质疑它们存在的理论基础。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年）中有力地抨击了“光辉城市，美丽花园”的思想，从而在整个欧美开创了一个反思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时代。其实，雅各布斯的先知先觉也是偶然间受到刘易斯·芒福德的启发才形成的，但这同时也受到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著作《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1960年）的影响，林奇在书中通过对城市“可意象性”（Imageability）的认知分析向现代主义城市环境的视觉层面发起挑战。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 1927年—）^②在《城市村民》（Urban Villagers, 1962年）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波士顿意大利移民区在被“城市更新”政策废弃的前夜所展现出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③的著作《联邦的威胁者》（The Federal Bulldozer, 1964年）用发人深省的统计学分析冷静而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错误政策。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一些社会学家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罗伯特·萨默（Robert Sommer）和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从人类学、心理学及建筑学的角度揭露了衰退的城市中心区在社会和物质层面的下降。然而就此而言，这些研究对华盛顿或其他各地的政治决策者们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小册子《社区与私密》（Community and Privacy, 1963年）是这方面一项有趣的早期研究，它由塞尔日·切尔西·耶夫（Serge Chermayeff, 1900—1996年）和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 1936年—）合著。俄罗斯出生的塞尔日·切尔西·耶夫经由英国曾前往哈佛大学和芝加哥设计学院学习，他的主要关注点是住宅社会学。该书旨在为“环境设计学”奠定基础，倡导建筑学借鉴并结合其他科学的分析研究成果。¹⁹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早的生态学研究之一，作者不惜笔墨，用大篇幅的内容反对城市迁往郊区，同时也讨论了现代生活的压力。然而，也有人认为它存在致命的缺陷——即全新的信仰：人类的“品味”是可塑的，所有有待改变的人类行为都需要一些政府的说服。

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其中两部分仍进一步演化为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一本著作。亚历山大出生于奥地利，战争年代他随全家移民到英国，最后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和建

① 美国第35任副总统和第36任总统，也曾是国会参议员。——译者注

② 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社会学家，1997—2007年间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是当时最多产、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译者注

③ 经济学家，政策分析师，作家，罗纳德·里根总统的主要顾问之一。——译者注

筑学。20世纪50年代晚期，他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社区与私密》中，他为典型的城市住宅建立了33种可变的设计，并将它们分成了一系列的小组（以IBM公司的704台计算机辅助完成），从而弥补了切尔马耶夫作品的不足。这种参数化的设计策略成为他博士论文的基础，因为他感到有必要研究现在这种难以解决的复杂性。1962年，他完成了论文《形式的综合：在理论上的注释》（The Synthesis of Form: Some Notes on a Theory）。²⁰两年后，他出版了《形式综合论》（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

这本书为设计师提供了分析和综合的模型，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番面貌：渴望找到一种复杂的设计方法以适应社会的多样性需求。亚历山大的方法是确定可能的设计参数，将它们合成为子集与树状图表，从而解决所有潜在的“格格不入”或形式与内容之间不和谐的相互关系。他还对“自觉”的设计和“不自觉”的设计进行了区分，并由此向西方建筑师奉为经典的设计（对亚历山大而言，这意味着形式与内容协调的完美设计）发起挑战，而这些所谓的“经典设计”案例从本土文化到第三世界文化都屡见不鲜。在这里，他还认为：现存的建筑传统和地域性材料易于表达建筑文化的独特性。亚历山大的这本书和他的博士论文还为一个“印第安村”的设计提供了141个设计参数。

正如亚历山大后来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他归纳的模型都有一个问题：在设计过程的编程阶段主观影响很大。但是，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1962年，在“十次小组”（Team 10）^①的会议上，亚历山大提交了“印第安村”的设计方案并与同样也热衷于建筑之人文主义理想的阿尔多·凡·艾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²¹这件事使亚历山大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树状图表，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城市不是树》（A City is Not a Tree）中，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早期认可的半格结构（semi-lattice structure）图表模式，借此各分支彼此间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叠加。²²在亚历山大看来，基于树形思考而设计的城市案例有很多，如新兴城市或近年来新建的城市——美国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和格林贝尔特、英国新城、昌迪加尔以及巴西利亚。他认为，正是由于各功能之间的分离和等级结构，这些城市规划现在已被证实是失败之举。他也列举了一些反其道而为之（反现代）的半格结构或“自然”城市的案例，如英国剑桥有很多各具特色的学院，它们并非界限分明而独立于城镇多彩生活之外的校园，相反，其周围环绕着咖啡馆、酒馆、商店和学生出租屋。他强调这种丰富和含糊正是人类生活的本质。

亚历山大的论文代表了其理论研究中一个有趣的转折点。现在，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已降格为设计方法论的实证主义专题研究，但是由于1967年他在伯克利创建了环境结构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ructure），因此他后来将研究方向转变成为建筑设计创建“模式”（patterns）。数学符号和点阵图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描述“模式”的更灵活的概念——一种在特定文脉下对特殊问题采取的“如果/就”的解决模式，同时这种方法还得到研究的支持。这些模式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建筑，且既适用于建筑单体，也适用于整个城市。

1968年，这一体系以《一种形成综合服务中心的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

① 十次小组是以史密森夫妇为首的一个青年建筑师组织，因其在国际建筑师协会（CIAM）十次大会上公开倡导自己的主张，并对过去的方向提出创造性的批评而得名。——译者注

Which Generates Multi-Service Centers) 首次出现，但也许一个促进他发展的更有影响力的因素则是他参加了联合国举办的“利马住宅方案设计”。这次设计由建筑师彼得·兰德(Peter Land) 担任项目经理，兰德毕业于伦敦建筑联盟学院 (London's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简称 AA)，后来受聘于耶鲁大学。1966 年，他说服秘鲁政府和联合国为住宅方案的展示举办一次专业性的国际竞赛，即“住房试点项目” (Proyecto Experimental de Vivienda, 简称 PREVI)，从而可以为第三世界的住宅设计树立一种典范。出于对 20 世纪 60 年代大行其道的“超级社区”方案的反对，兰德在 1970 年的方案中提倡一种高密度、低层住宅的紧凑发展，这种方案实行人车分离，中间集中安排了社区设施、公园以及 450 个邻里单元，其周围由人行步道所环绕。住宅群的设计还包括有内天井、穿堂风、价格低廉的可扩展系统以及抗震结构。这一方案由 24 个建筑设计团队共同完成——包括 12 个秘鲁团队和 12 个国际团队，其中也有亚历山大的设计事务所。²³

亚历山大及其合作者的工作成果不仅体现在方案上，还体现在另一本囊括了 67 种模式的著作——《模式生成住宅》(Houses Generated by Patterns, 1969 年) 上，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来自秘鲁的住宅设计研究。正如亚历山大希望的那样，这些结合了组群、内部更关注“单元”、停车（很小的场地），强调行人路径的模式，“可能会促使一种新的秘鲁本土的建筑特色开始变得明确起来”。这种模式尤其对秘鲁文化习惯的敏感之处充满兴趣，如需要夜间舞厅，步行穿越学校，严格的私密梯度以及住宅入口处过渡空间的设计 (图 P.2)。他们不但在重建地方传统的总体意图上不够成功，而且在建筑感的表现上也不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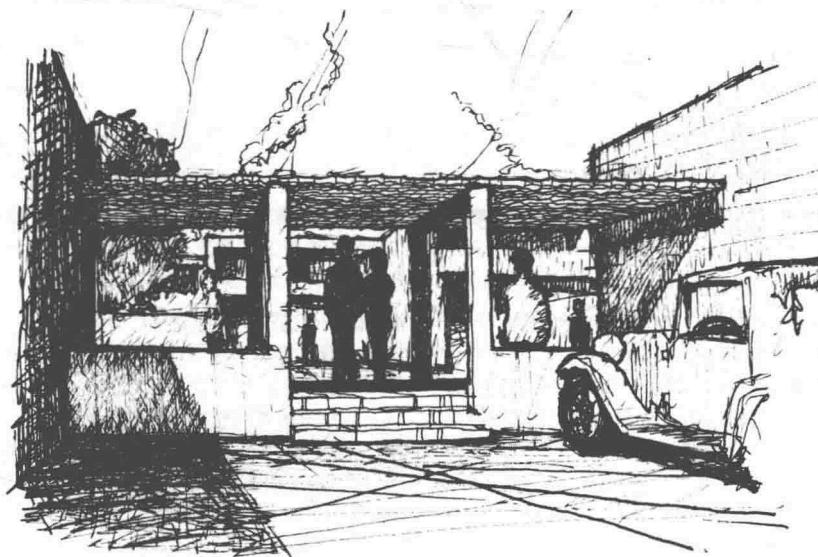


图 P.2 “入口空间”的示意，来自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桑福德·赫申 (Sanford Hirshen)，萨拉 - 石川佳纯 (Sara Ishikawa), 克里斯蒂·科芬 (Christie Coffin) 和什洛莫·安格尔 (Shlomo Angel),《模式生成住宅》(Houses Generated by Patterns, 1969 年)。本图得到“环境结构中心”的许可

功。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这些不足却为他极具影响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再进行讨论。

11 1968 年

虽然以上的这些活动都有良好的初衷，但却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的一些突发事件戛然而止。1963 年，总统约翰·F·肯尼迪（1917—1963 年）^① 遇刺身亡令冷战时期的美国首次受到重创，一年之内，他的继任者林登·B·约翰逊作出了一个给日后带来灾难的决定——逐步加强对越南的战争，并通过制定扩军草案为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兵力。同时，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 年）领导的民权运动在美国南部初步成形。政治抗议首先要求和平，但当一些立法在地方和全国的注册选民中获胜之后，1965 年时，塞尔马的暴力事件和沃茨的骚乱打破了这种平静。每年夏天，全国的黑人社区都会发生一些冲突，并会演变为暴力事件而蔓延开来。这些暴乱往往与当时普遍存在的反战示威游行相伴而行，不断地刺激着广泛联盟的觉悟青年。作为“婴儿潮”一代^② 的抗议者，其思想意识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波及马克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学者和知名人士，当然还有嬉皮士。一夜间，整整一代人被反正统的、全新的摇滚乐歌词所煽动，团结在反主流文化的叛乱中，这种时代特征因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 年）^③ 和昆廷·菲奥里（Quentin Fiore, 1920 年—）^④ 的精辟论调“你不能再回家”而名垂后世。²⁴

欧洲学生同样也不稳定，但这种心神不安似乎受其内部因素的驱使。一般而言，欧洲的年轻人对待政治也十分严肃认真，几乎全部的社会主义热情仅仅因不同的战争策略而产生分歧。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时，意大利常年不稳定的政府因其体制受到由北方学生与工会组成的革命联盟的攻击，已沦落到维持无政府和游击战的状态，而这次攻击的主要原因在于该联盟对南方农民的不满。同样，这一事实也隐含着对建筑领域的暗示，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跨越文化既存在于威廉·莫里斯的反工业主义中，也存在于赫伯特·马

① 美国第 35 任总统，其任期从 1961 年到 1963 年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为止。他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肯尼迪政治家族中的一员，是美国自由派的代表。他的遇刺被视为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决定性影响的事件之一，因为这一事件在其后数十年中一直影响了美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译者注

② 在美国，“婴儿潮”一代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 1946 年初至 1964 年底出生的人，人数大约有 7800 万，他们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60 年代中叶，越战期间，美国的年轻人掀起了反越战和“嬉皮”风，这只是一个消极的反抗，缺乏积极的建设性的思想。——译者注

③ 加拿大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现代传播理论的奠基者，其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媒体的认知。在没有“互联网”一词出现前，他已预示了互联网的诞生，并首先使用“地球村”一词（global village）。自 1960 年起，他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但又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译者注

④ 图形设计师，其主要作品集中于图书领域，并以 20 世纪 60 年代时期的设计著称，他将文字与图形或不同尺度的装置以动感的、非传统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与 60 年代激昂狂暴的时代精神相契合。——译者注

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年)^① 的技术焦虑中, 而他们都对技术进步普遍怀疑, 或者说是不公开的反对。

欧洲的多次混乱局面也可被视为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上演的各种街头戏剧。在这些参与与表演的团队中, 更有影响的是受达达主义鼓舞而于 1957 年创建的左翼联盟“国际情境主义”(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简称 SI)^②。经过几轮置换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 居伊·德波 (Guy Debord, 1931—1994 年)^③ 的思想策略开始被“国际情境主义”所认可, 其著作《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67 年) 对这些思想原则进行了扼要地阐述。马克斯·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1895—1973 年)^④ 和特奥多尔·W·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 年)^⑤ 以多种途径更新了早期关于“文化工业”的理论, 德波在其中概述了 221 篇短论文的策略 (它们中有很多是故意从其他人那里剽窃而来或掩饰了这种剽窃), 由此他抨击了发达资本主义、大众媒介、消费文化 (商品拜物教)、宗教、家庭——简而言之, 任何与“资产阶级”生活有远亲关系的事物。最后, 他认为西方文化沉迷于每晚在夜间新闻中看到的“壮丽景象”, 因而已变得毫无希望, 而且亡羊补牢也无济于事。情境主义者选择在街道中将无政府的“情境”表演出来以对抗这种日渐衰弱的习惯, 实际上, 他们因自己是“剧中专家”而自豪。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其他地方, 1968 年都是上演这类精彩表演很典型的一年。就美国而言, 这一年年初便已预示了一种不祥, 美国一侦察船在朝鲜海岸被截获, 一周后, 越共从越南南部发动了他们的新年攻势^⑥, 6 万名士兵越界进入南部一路直达西贡。^⑦ 这次大屠杀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这也导致 3 月底林登·约翰逊放弃竞选下任总统, 从而将美国总统竞选置于完全开放的状态。与此同时, 中欧斯洛伐克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1921—1992 年)^⑧ 取代了安东尼·诺沃提尼 (1904—1975 年)^⑨, 成为共产党第一书记。这一令人欢呼的对抗

-
- ^①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他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译者注
- ^② 由前卫艺术家、知识分子、政治理论家组成的激进国际组织。“国际情境主义”活跃于 1957—1972 年间, 其思想基础源自反独裁马克思主义和 20 世纪初的前卫艺术运动——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 它试图综合两者的精髓以成为 20 世纪中叶一种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批判。——译者注
- ^③ 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字母主义成员、国际情境主义的创始者、电影导演。1967 年出版的《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是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 对于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左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1994 年在刚度过 63 岁生日后几周, 他自杀身亡。——译者注
- ^④ 德国哲学家,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 ^⑤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及作曲家, 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 其社会批判思想使他自 1945 年起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取得显赫的学术地位。——译者注
- ^⑥ 也称作“春节攻势”, 指 1968 年 1 月越南民主共和国 (北越) 正规军和越共游击队联手, 针对越南共和国 (南越) 境内各军民指挥体系枢纽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该攻势是越南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地面行动, 也是造成美国主动自越南撤军的关键事件。——译者注
- ^⑦ 越南城市, 现称胡志明市。——译者注
- ^⑧ 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 于 1968 年 1 月到 1969 年 4 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译者注
- ^⑨ 1953—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译者注

标志着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结束了苏联长达 20 年的统治，迎来了“布拉格之春”。由于铁幕的阻隔，人们长期中断了与欧洲其他部分的联系，此时重获自由的喜悦溢于言表。

这种兴奋对法国学生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3月，法国学生欲占领巴黎大学^①的楠泰尔（Nanterre）校园并要求主要的大学进行改革。4月，马丁·路德·金惨遭暗杀，这无异于给高度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5月初，索邦对示威者的逮捕又进一步引发了游击战、罢工、路障和暴乱，从而使巴黎大部分地方遭遇了近两个月的戒严。同时，意大利学生占据了主要大学的大部分地方，并与工人一起迫使多数意大利的经济生产停滞。6月，罗伯特·肯尼迪（1925—1968年）^②在洛杉矶一家酒店的厨房遭到枪杀。这一年的夏天，人们不仅目睹了一般的种族暴乱、反战示威游行，还目睹了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有关“警察防暴”的电视现场报道。愤怒的欧洲学生和知识分子从容地高举旗帜，其上绘有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③、切·格瓦拉（1928—1967年）^④以及苏联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06—1982年）的肖像。8月初，还有众多坦克和50万华约（即《华沙条约》，Warsaw Pact）军队响应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人性的社会主义”的号召。人们将杜布切克捆绑着拖至莫斯科参加所谓的“讨论”，几周后他返回布拉格，并在电视摄像机前眼泪汪汪地宣布放弃其犯罪活动。对很多观察家而言，1968年的政治和军事景象存在着一些内在的悖论，仿佛并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面对这一年的喧闹与狂怒，现代建筑师们曾经的远大抱负也未能幸免于难。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那样：虽然现代性和进步的拥护者怀有创造美好世界的良好愿望，但直到此时，对于未来却表现出一种近乎一致的看法。这种高尚的职业形象与它的乌托邦激情一起仿佛断裂似的置于途中，却不能被完全理解。这种共同目标和技术进步的准则不仅很快遭到本行业年轻人的拒绝，而且对于越发不安分的建筑风格的“女主人”而言，即使有一天将真的离开家庭，她也会义无反顾，誓不回家。

① 巴黎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前身为索邦学院，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其授课历史大约可追溯到12世纪中期。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之后，巴黎大学被拆分成13座独立的大学，沿用“索邦”称谓的大学为巴黎第一大学、巴黎第三大学和巴黎第四大学。——译者注

② 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译者注

③ 古巴前领导人。20世纪50年代，领导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坦亲美独裁政权，成功地将古巴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成就。——译者注

④ 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也是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古巴革命胜利后，任古巴政府高级领导人。后来辞去职务，离开古巴到第三世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自切·格瓦拉死后，他的肖像便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和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译者注

目 录

序言 20世纪60年代

第一部分 20世纪70年代

第1章 打破旧风格：1968—1973年	3
第2章 意义的危机	23
第3章 早期后现代主义	37
第4章 现代主义的持续	49

第二部分 20世纪80年代

第5章 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的地域主义	69
第6章 传统主义和新城市主义	84
第7章 理论的黄金时代	98
第8章 解构主义	112

第三部分 20世纪90年代及现在

第9章 风暴复苏	129
第10章 实用主义和后批判性	141
第11章 极简主义	155
第12章 可持续与超越	171
注释	183
致谢	229
人名对照表	230
译后跋	241

第一部分 20世纪70年代

15